

东吴讲堂

未来面临的挑战：语言学与中国

——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法] 曹茜蕾 (Hilary Chappell) 著 张赞 顾小洁 译 王健 译校

摘要：现在世界上共有六千—七千种不同的语言。有学者估计，到本世纪末大约会有一半甚至更多的语言消失。语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作为一个语言学家，要及时调查、记录、整理、描写濒危语言，为后人留下关于这些语言的宝贵资料；同时，也要呼吁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双语甚至多语教学，以使濒危语言能够生存下去。在这篇讲演中，我会在介绍国际濒危语言问题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湖南西部乡话的研究，为听众描绘中国境内濒危语言（方言）的现状。

关键词：言语学；双语；多语教学；汉语方言

今天我的讲座的题目是《未来面临的挑战：语言学与中国》。首先，我会给大家介绍国际上关于濒危语言研究的现状；接下来我会重点介绍中国濒危语言或者方言的研究状况；最后我还会介绍我主持的一个欧洲理事会的科研项目“汉语方言混合语法类型比较 (SINOTYPE)”，这个项目在座的王健教授也参加了。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上关于濒危语言研究的最新进展。现在世界上大约有六千—七千种分属于四百—五百个不同语系的语言。据保守的估计，到本世纪末，其中将有超过一半的语言会消失 (R.M.W. Dixon 1997: 17; Nettle 1999)。^①在另外一些专家看来，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 (Krauss 一九九二)。二〇〇一年联合国内罗毕会议发表的《联合国环境计划》中也指出，到本世纪末，即将消失的语言会占现存语言的一半以上。

更令人担忧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二〇〇三年的研究报告指出，世

界上至少有二千五百种语言濒临灭亡，这其中三分之一的语言在亚洲（确切地说是 33%）、三分之一的语言在非洲（确切地说是 30%）、19% 的语言在太平洋地区、15% 的语言在美洲、3% 的语言在欧洲（也见于 Peyraube 二〇〇五；Moseley 二〇一〇）。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每年大约有二十五种语言会消失。有些学者甚至估计，每周都会有一种在世界某个角落使用的语言或者方言会消失。

那么，是谁在使用这七千种不同的语言呢？为什么我们要保护这些语言呢？

实际上，按照 Ethnologue (二〇一四)，94.5% 左右的语言仅为占总人口数的 5.8% 的人所使用，并且这部分人分散在一些很小的社团中。剩下的 5.5% 的语言为占世界人口 94.2% 的人所使用。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那么，世界上主要的语言有哪些呢？

你们也许会猜到，就母语来说，世界上最

^① 按照 Ethnologue (Lewis et al, 2014) 用的算法，世界上有 7,106 种语言，只分属于 136 个不同的语系。

主要的三种语言是：汉语（官话），西班牙语和英语，接下来是印地语，然后是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孟加拉语，俄语和日语（Ethnologue 2014：9）。英语是位列第一的全球性语言，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使用者，有 11.43 亿人在使用。当然，这其中仅有 3.31 亿人是把英语作为母语使用（Ostler 2010：227）。除此以外，还有 8.12 亿人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作为地区共同语使用。这部分人占了英语使用者的很大比重。作为一种全球性语言，英语无疑在外交和国际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全世界一百零五个国家把英语作为主要语言。

汉语（官话）的使用情况跟英语截然相反。它拥有 8.40 亿的母语使用者，另外还有 1.78 亿人把它作为第二语言，作为共同语来使用。把汉语（官话）作为母语的使用者远远多于把它作为第二语言（共同语）的使用者。

第二种世界主要语言是西班牙语。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数比说英语的多，有 4.14 亿人。这是因为在十六世纪，西班牙在中美和南美进行了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把西班牙语带到了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阿根廷等国家。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像葡萄牙那样，只有 1100 万人口的小国，其语言葡萄牙语在世界范围内却有 2.03 亿人在使用。这全是因为它先前对巴西的殖民入侵。有 2.6 亿人以印地语为母语，母语人口位居第四位。以印地语为母语的人主要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印度北部地区。阿拉伯语以 2.37 亿的使用人数位居第五位。多数说阿拉伯语的人居住在北非和中东。^①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什么是已经灭绝了的语言（extinct language）。简单来说，灭绝了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再被任何人使用的语言。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情况。第一类情况是，许多所谓的灭绝了的语言仍然以书面语的形式存在，而且与文学和宗教传统密切相关；不过，在日常交流中，没有任何一个社团会在口语中使用它们。这些语言只被作为研究的对象而存在。拉丁语、梵语、古阿拉伯语和汉语文言文就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下面我们以拉丁语和汉语文言文为例

进行说明。

拉丁语在罗马帝国时期和中世纪的欧洲被广泛使用。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的现代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加利西亚语，加泰罗尼亚语、法语、奥克语、科西嘉语、意大利语、撒丁语、列托罗曼语和罗马尼亚语都是拉丁语的后代。公元八世纪后，现代罗曼语族各语言的祖语之间已经无法互相通话。就一种口头语言而论，拉丁语灭绝了。但是，直到今天，拉丁语仍然为罗马天主教会所使用，用于宗教礼仪或者某种特殊情形下的交流，比如主持弥撒、教皇选举等。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文艺复兴末期，以口语为基础的学术和科学语言（language of erudition and science）才开始出现。十五世纪，以口头语言写就的印刷作品才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眼前。

下面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已经灭绝了的语言——汉语文言文。上古汉语的口语形式被认为是中古汉语和现代各方言的始祖。文言文很可能代表了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在宫廷中广泛使用的正式的书面语。直到一九〇五年科举考试被废除之前，对那些想通过科举考试而金榜题名的人而言，文言文一直是主要的学习对象。文言文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现代标准书面语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文言的遗存。这些文言成分甚至会被借用到口语中，比如我们经常使用的成语。

属于这一类的已经灭绝了的语言为数不多。绝大多数的灭绝了的语言属于第二类：它们灭绝之后就永远消失了，不管是口语形式，还是书面形式。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也就是

① 这些数据我主要依据 Ethnologue(2014) and Ostler (2010)。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学者和机构所统计的语言使用人口可能差别很大。这与大家使用的不同的统计方法有关，也与不同的学者对“语言”和“方言”的理解不同有关，还与对联系紧密的语言的处理有关。比如乌尔都语与印地语是可以相互通话的，乌尔都语有 6400 万母语者，如果把这部分人口也算作印地语的母语者的话，那印地语的母语者就不是 2.6 亿人，而是 3.24 亿人了。不过，出于社会政治的原因，乌尔都语和印地语被认为是两种语言。以乌尔都语为母语的人多信奉伊斯兰教，其祖国是巴基斯坦；以印地语为母语的人多信奉印度教，多居住在印度北部。

说, 这些语言不会“死而复生”。^①

那么,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语言的灭绝呢? 确切地说, 与动植物不同, 语言不会因为自身的演变机制而自然衰退以至消亡。语言灭绝的动因有两个: (1) 自然动因, 其结果是语言消亡, 但没有伴随语言更替 (language shift); (2) 政治和文化动因: 语言更替造成语言消亡。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几个彻底灭绝的语言的实例。因为说某种语言的人群消亡了, 自然这种语言也就绝迹了。导致人群消亡的原因可能是诸如地震或者火山爆发之类的自然灾害, 也可能是像天花那样的疾病。

比如西夏语就是随着西夏人被种族灭绝而消失的一种语言。一二二七年, 蒙古成吉思汗下令屠杀中国西部的西夏人 (唐古特人)。为什么呢? 有历史证据表明, 这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对蒙古不忠诚。西夏人说的西夏语是一种藏缅语, 而且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文字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被俄罗斯语言学家破解。

还有一个例子是松巴哇 (Sumbawa) 岛上的坦博拉语。松巴哇岛属于爪哇和帝汶之间的印尼群岛松德 (Sonde) 列岛。一八一五年, 一场火山爆发将说坦博拉语的所有人, 连同他们的语言掩埋在火山灰下。现在我们只能推断他们的语言可能属于南岛语系 (请看 Hagège 2000:127)。

更为常见的情形是语言更替 (language shift)。在双语情况下, 一般来说, 一种声望比较低, 由较少人使用的语言会在一两代人之后, 被声望较高的语言替代。更替的速度会很快。比如在美国夏威夷, 现在仅有不到 1% 的人仍然使用属于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夏威夷语, 其他人都使用英语了。在新西兰, 土著毛利人只有 10% 还使用属于南岛语系的毛利语, 90% 的毛利人是英语单语者。直到最近, 由于有了政府的支持, 毛利语才在慢慢复苏。中南美洲成百上千种语言由于十六世纪早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扩张而消失。美洲土著居民的人口数量也由于战争和流行病肆虐而锐减。其中有一些疾病是原住民从未遇到过的。这些疾病夺去了大量人的生命。如今, 墨西哥和巴西的大量土著语言已经被联合国列为濒危

语言。

在我的祖国澳大利亚, 原有大约二百三十一-二百五十种语言被当地居民, 即澳大利亚土著人使用。十八世纪晚期, 欧洲人到达澳洲大陆之前, 有约六百个土著部落的居民过着游牧狩猎和采集的生活。十八世纪末, 英国开始殖民扩张, 澳大利亚东南部, 也就是如今的悉尼、墨尔本以及塔斯马尼亚, 那里的土著居民由于中毒、被屠杀或感染殖民者携带的疾病而大量死亡。在短短的两百年时间里, 在澳洲土地上生活了四万年的土著居民使用的大约二百五十种语言中的一百种就完全消失了。另外还有大约一百一十种正濒临灭绝, 只有一小部分人还在使用; 其中一些人把这些语言跟别的语言混合使用 (Nettle & Romaine 2000, Dixon 1997: 143)。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大约只有二十种语言是有活力的, 被超过一千人使用。最重要的是, 在这些稳定的社团中, 仍有儿童学习这些语言, 这使得这些语言可以被传承下去 (AIATSIS NILS report, 二〇〇五)。如今, 这样的社团大多数位于昆士兰北部、北领地 (Northern Territory) 和西澳大利亚北部等偏远地区。

那么, 语言的消失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呢?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 在二十一世纪靠着英语和汉语就可以过活了。其实语言的消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是沉重的损失。以澳大利亚土著人以及他们消亡的语言为例, 有些代价我们是想象得到的。首先, 先人的传统无法继承, 先人的智慧以及口述历史会随之而失传。而这些又与各种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联系: 传统节日、工艺和技术, 当地环境知识——植物和动物的分类, 以及神话, 尤其是创世神话。

拿人类植物学来说, 在澳大利亚北部曾经实施过达利河项目 (Daly River Project)。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一部综合性的词典。这部词典准确地涵盖了在该地区生长的植物的地方名

^① 当然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 20 世纪初, 从公元 2 世纪之后就主要作为一种书面语而存在的希伯来语重新恢复了其口语交际的功能。自 19 世纪起, 爱尔兰的盖尔语 (Gaelic) 也经历了类似的复苏, 但是不如希伯来语那样成功。

称及学名,也包括了有关这些植物在营养和药用方面的价值的传统知识。而人类植物学才刚刚被澳大利亚白人(他们是欧洲人后裔)所接受,他们希望可以借此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当地的动植物及其在土著社团里发挥的作用。还有,那些反映土著居民的神话传说及黄金时代(Dreamtime)故事的艺术品,如今也深受青睐。另外,世界上90%的小语言使用者组成的社团,人数虽少,但往往有着复杂的亲属系统(kinship system)(Dixon 一九九七)。复杂的亲属系统不仅反映在结婚仪式、社会义务等方面,在语言中也有反映。比如,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东北部有一种土著语言——Dyirbal语。在说这种语言的集团中,丈夫不允许和岳母说话,妻子也不允许跟公公交流;而丈夫和岳父之间使用特殊的敬语,词汇比日常语言所用的受到更多的限制。

总而言之,语言不仅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也体现着我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社会规范和信仰。事实上,语言涵盖了我们的所有遗产。

在人类进化的研究中,学者们通过推理早就发现,人类正是拥有了语言这一强有力的工具才使他们能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有效地提高生存的机会——在向农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狩猎和采集食物时一起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对汉语来说,其书面语记录了三千多年连续的历史。不言而喻,没有一个社团或社会,不管其规模是大是小,可以完全不使用语言而正常运转。

第二部分我会讲汉语的多样性,这也是我的主要研究。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跟藏缅语族的语言是姊妹关系。主要根据方言的语音和词汇特征,学者们把汉语分为十大方言区,分别是:官话、晋语、湘语、赣语、徽语、吴语、闽语、客家话、粤语、平话(一九八七年版《中国语言地图集》)。其中,晋语、徽语和平话在更早的方言分区实践中不被看作是独立的大方言区。下面这张表显示了这十大方言的地理分布、使用人口和代表方言点。

方言区	地理分布	使用人口(百万)	代表方言点
1 官话	东北、华北、山东, 西南	799	北京

2	晋语	山西、陕西, 内蒙古	63	太原
3	湘语	湖南	36	长沙
4	赣语	江西	48	南昌
5	徽语	安徽	3.3	绩溪
6	吴语	浙江、江苏南部	74	上海 宁波
7	闽语	福建、台湾、广东东北部	75	福州 潮州
8	客家话	福建西南部、广东东北部	42	梅县
9	粤语	广东、广西	59	广州
10	平话(包括土话)	广西、广东、湖南	7.8	南宁平话 桂林平话
总人数: 12 亿				
数据来源于 1987 版本的《中国语言地图集》。				

从上表可以看出,官话方言使用人口最多,分布也最广,从东北到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其余多数方言在地理分布上与官话方言互补,多位于东部和东南地区;只有分布在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的一部分的晋语嵌入了官话方言区。中国东南方言以其内部差异大而著称,详细的讨论可以参看游汝杰(一九九二)和我自己的研究(Chappell 二〇〇一、将刊)。

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在西方,语言学家们通常会把各地不能通话的方言认为是不同的语言。根据 Dixon (1997:5) 的研究,两种语言/方言共同拥有的材料(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要达到 70%,才能互相通话;如果共有的材料不足 50%,则通话就有困难。所以,从语言学的技术层面上说,互相无法通话的汉语方言就被认为是不同的语言。那么,在中国,为什么它们通常被称为“方言”,而不是“语言”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一,所有的这些语言/方言都是从同一祖语——原始汉语演化而来;二,在学校学到的书面语是基于官话和文学语言的,是全民共享的交际工具,它使全民团结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多语言的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共同语”作为官方语言。“普通话”就是中国的“共同语”。它在一九五八年被官方正式采用并且推广得相当成功。普通话由以下不同要素构成: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官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典范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现

在已经成为政府、学校、医院、媒体和其他工作场所的主要交际工具。在推广普通话的第一个阶段，一九六〇年左右，为了帮助不同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语言学家们在中国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方言普查。他们记录了非常宝贵的不同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并与普通话进行对比。其后，语言学家又着手详细描述不同方言的特殊语法特征，并与普通话及世界上其他语言进行比较。

接下来我们谈谈中国的语言接触问题。说到语言接触，我们一般都会想到没有亲属关系的，分属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的接触。我今天则会介绍相互有亲属关系的语言（方言）之间的接触。在通用语或官方语言广泛使用的背景下，语言学家们对语言（方言）接触的后果这一研究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就像是一个语言学实验室，全国各地的方言、土话之间，它们与普通话之间都有接触。因此，语言学家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地方方言使用者是双语者或者多语者，并且他们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使用普通话时，当地方言在形式和性质方面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方言会不会在结构上发生彻底的变化？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像普通话，以致彻底被普通话同化？

观察语言（方言）接触的后果对语言学家彻底了解语言是怎样变化的至关重要。我们不仅可以借此更好地了解语言演变的机制，还可以了解由于接触造成的语言变化背后的认知过程。

接下来，我想通过简要地介绍自己对湖南省西北部地区的一种鲜为人知的语言（方言）——乡话的研究来说明语言（方言）接触的后果。

从二〇〇六年起，我在湖南西北部古丈县高峰乡进行了七次田野调查，总共大约有十个月的时间。那里的人说一种比较保守的方言——乡话。乡话目前仍是一种系属未定的方言，属于濒危方言之一，只在偏远的山区才有人使用。与其他汉语方言相比，乡话在词汇和句法方面有一些独有的特征。

我调查的古丈县属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湘西，除了乡话外，还分布着属于苗瑶

语族的苗语、属于藏缅语族的土家语、属于汉语的西南官话（当地人管西南官话叫“客话”），再往南还有属于汉语的湘语。乡话被其他的语言或者方言包围着。根据一九〇七年董鸿勋所著的地方志《古丈坪厅志》记载，当时乡人大约 78% 是单语者，他们只会说自己的母语——乡话；大约 9% 的人除了乡话外，还会说西南官话；还有 13% 的人已经不会乡话，而只会西南官话。与此同时，周围 72% 的苗族和土家族也将西南官话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使用。而以西南官话为母语的人都是单语者，因为西南官话在当地是一种有声望的语言（prestige language）。而到了一九九八年，根据澳洲墨尔本大学伍云姬的调查，西南官话的使用者大大增加，尤其在乡话方言的分布地区，90% 的说乡话的人是双语者，他们同时也会说西南官话；还有一些人甚至只会说西南官话。我们可以看出，一百多年以来，乡话社团的语言使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十世纪初，说乡话者基本属于一个孤立的单语社团（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说乡话的人也不跟苗族、土家族通婚）；而一百年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

今天的乡话里有一些借自西南官话的成分。比如：借自西南官话的表示处置的介词“把 [pa⁴¹]”与乡话中原有的表处置的介词“跟 [kai⁵⁵]”共存；再比如：借自西南官话的表示完成和已然助词“了 [liau⁴¹]”与乡话原有的已然助词“噶 [ti⁰]”并存。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更复杂的例子。

乡话的否定词用 [ba²¹³]，不过，西南官话的否定词“不 [pu²¹³]”也被借入到乡话中，用来表示对未来事件的否定。在 VERB-NEG-VERB 正反问句中，只能用“不”，不能用 [ba²¹³]。比如：

(1) 明天你去不去？

moŋ³³tiau⁵⁵ ɲi²⁵ khəw³³ pu²¹³ (*ba²¹³) khəw³³
tomorrow 2SG go NEG go

与此相反，只有 [ba²¹³] 可以出现在句尾表示疑问，“不”不行。比如：

(2) 明天你去不？

moŋ³³tiau⁵⁵ ɲi²⁵ khəw³³ ba²¹³ (*pu²¹³)
tomorrow 2SG go NEG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二〇〇三年发布的关于“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的报告列出了九条标准来判别一种语言是处于濒危状态还是稳固状态。其中前两条标准是最具有启发性的。这两条标准分别是：（1）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2）使用语言的绝对人口。以第二条标准来看，乡话看起来是有活力的，因为它有大概三十万使用者（陈晖、鲍厚星，二〇〇七）。然而，以第一条标准来看，古丈县古阳镇的乡话已经不再能够完整地传承给下一代了。新一代人在家里使用西南官话，在学校里使用普通话。与此对比，在古丈县高峰乡李家洞，孩子们在上学前只使用乡话，上学后在家里也主要使用乡话。在高峰乡李家洞，当地村民大多以乡话作为母语，他们跟外界交流时则使用西南官话或普通话。因此，古丈县县城（古阳镇）与偏远的高峰乡在语言使用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像大多数方言一样，乡话没有书面形式可以帮助其保存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我们语言学家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把这种方言描写下来，尽可能详细地记录这种方言的语法的方方面面，尽可能多地记录下用方言讲述的故事，描写说这种方言的人的风俗和习惯，以便让他们的后人能够了解。

事实证明，乡话是非常古老的，保留了上古汉语的一些特征，可以帮助我们重建早期汉语的结构。下面这张表是一些乡话词汇的例子（取自伍云姬、沈瑞清 2010：73-82，以及我自己田野调查的材料）。

乡话音标	汉字	英译	普通话
t ^h a ⁴¹ tan ²¹³	铁鼎	pot, wok	锅
t ^h oŋ ⁵⁵	铛	a pot with handles for frying vegetables	有耳的炒菜锅
liɛ ²¹³	啼	cry	哭
k ^h uai ²⁵	犬	dog	狗
mɿŋ ³³	望	to look	看
f ²⁵	虺	snake	蛇
ziəw ²¹³	食	to eat	吃
li ²⁵	履	shoe	鞋
dza ³³	字	to like	喜欢

乡话以及其他一些汉语方言的材料对我们填写中国语言的演变中的空白是非常重要的。

汉语（包括各地方言）拥有着一些其他语

言所没有的特殊性质。完整准确地描写汉语（包括各地方言）可以帮助专业语言学家了解汉语结构上可能的变异。这也会对以所有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类型学提供帮助。类型学着眼于研究语言的哪些特性是世界上所有语言共有的，哪些特性是仅为某些语言所独有。类型学家相信，语言的变异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语言是建立在我们共同的认知机制上的。不管我们所说的是何种语言，我们的大脑的能力是共同的。在过去的四年半时间里，我在巴黎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SINOTYPE。这个小组主要的任务是对汉语方言的类型特点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这项研究任务得到了欧洲研究理事会的资助，项目的全称是“汉语方言混合语法类型比较”。小组的七位成员每人负责调查一种不为外界熟知的汉语方言，每人用英文写出一本自己负责调查的方言的描写语法著作。这些著作会陆续在 Mouton de Gruyter 公司出版。

下面是我对今晚讲演内容的总结。

如果没有“小语种”的材料，我们不可能拼出人类语言的完整的拼图。然而，到二十一世纪末，75%到90%的语言可能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语言学家不想失去语言的多样性以及与之相随的文化遗产。语言的多样性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更准确的关于语言结构的信息，还间接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人类文化和社会结构进化的窗口。

语言和方言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我们正在失去重要的构成人类语言能力的部分。如果只有大约二十五种主要语言留存下来，那么，90%以上的语言所呈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难以被发现。未来面临的挑战促使我们竭尽全力去保护我们的语言和方言。例如，我们可以促进双语（或双方言）甚至多语（多方言）的实践，来保护语言的多样性。这样，丰富的，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也就可以保存下来，因为文化遗产与语言密切相连。

我很认同伟大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歌德（一七四九 - 一八三二）的一句格言：Wer fremde Sprachen nicht kennt, weiss nichts von seiner eigenen (Maximen und Reflexionen 91)。这

句话的意思是：那些不懂外国语言的人对他们自己的语言也会是一无所知。我相信，歌德的观点不仅对外语而言是如此，对任何一种语言或者方言而言也是如此。即便我们不鼓励多语的实践，我们也应该鼓励和维护双语的实践，并把它作为对未来的投资。因为，语言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也会为我们每一个人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

问：感谢您的精彩讲演。我对您刚才提到的语言类型学很感兴趣。我想请教一下，如何研究语言类型学？

曹茜蕾：研究语言类型学首先要收集大量的语言材料。这些语言材料可能来源于可靠的参考语法书。像王健教授对疑问代词的研究，就收集了好几百种汉语方言的材料，建立了一个样本库。然后我们可以对不同的语言的某个语法范畴或者某个词类进行比较，看看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有什么差异，有什么限制。语言的变异一定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寻找变异的范围。我在过去几年研究了汉语被动句和处置式，发现，汉语被动标记和处置标记的来源不是无限的。所以，研究语言类型学，要掌握大规模的语言材料，然后进行仔细的对比。

问：首先我想感谢曹教授的精彩讲演。我的问题是，像您这样一个外国人到中国乡下进行田野调查，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肯定在交流中会有一些障碍。请问您是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的？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曹茜蕾：谢谢你的问题。我很喜欢到古丈县高峰乡李家洞进行田野调查。那里的人对我都非常友好。可能我是第一个从欧洲到那里进行调查的人。他们对我很好奇，会问我为什么你对我们的语言感兴趣。我已经去那里调查七次了。现在跟发音人很熟悉了。每次我去那里，他们都会幽默地说：“你又来了，你的工作还没做完啊？书还没写好啊？”那里的人帮了我很大的忙，他们非常好客。我住在当地的招待所，跟发音人全家一起吃饭。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录他们的话，录他们的故事。时间长了，我也跟当地人一样，很能吃辣。

问：曹教授，很感谢您为我们奉献了一场如此精彩的讲演。我注意到，您讲演的时候一直是站着的，这很让我们感动。我的问题是，在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些偏远地区还很贫穷，那里的人只有学好普通话才有更多的机会。您觉得在那些偏远的，相对落后的地区如何保护濒危语言呢？

曹茜蕾：谢谢你的提问。王健教授要求我用英语讲演，我为了让大家都听清楚，所以站着讲演，这样声音可以传得更远一些。确实，在相对贫困落后的地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生存下去。但是，我觉得在这些地区，在保护濒危语言和发展他们的对外交往能力之间可以达到某种平衡。比如可以开展双语教学。在澳大利亚北部，政府开设了一些双语学校。那里的土著可以一边使用他们的母语，一边学习英语。我想，中国乡下的情况跟澳大利亚的情况十分类似。

问：感谢您的讲演。其实大多数中国人都双语者，我们会说普通话和自己的方言。不过，现在有些年轻人不会说自己的方言了。如果只会方言的话，也会使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您认为我们如何在普通话和方言间保持平衡？

曹茜蕾：我认为在普通话和方言间保持一种平衡是完全可能的。我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遇到很多中国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既会说普通话，也会说方言，有些人还会说不止一种方言。我认为，学习普通话跟保持自己的方言间没有什么矛盾。人的大脑的潜能是无限的，我们掌握两种、三种，甚至更多的语言是完全可能的。不同的语言或者方言适用于不同的场合。

致谢：

本研究成果承蒙“欧盟第七框架计划(FP7/2007-2013)下之欧洲研究理事会(ERC)R拨款资助(ERC基金批准号230388,资助课题：“汉语方言混合语法的类型比较(The hybrid syntactic typology of Sinitic languages)”，谨此致谢。本人还要感谢常熟理工学院的丁晓原书记和人文学院黄斐副院长、王健教授请我做客东吴讲堂。感谢贝罗贝教授和王健教授对此次

讲演提出的建议。感谢张赞和顾小洁为我翻译此次讲演。我还要特别感谢乡话的发音人对我的帮助。

参考文献: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tudies. 2005. National Indigenous Language Survey Report.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http://arts.gov.au/sites/default/files/pdfs/nils-report-2005.pdf>

Bernard, H. Russell. 1997. "Language preservation and publishing." In Nancy Hornberger (ed.), *Indigenous literacies in the Americas: Language planning from the bottom up*.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139-156.

Chappell, Hilary (ed.). 2001. *Sinitic languages: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pell, Hilary. Forthcoming, 2015. 'Diversity in Sinitic languages: micro-areas in China for object marking, passive and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In H. Chappell (ed.).

Chappell, Hilary. (ed.). Forthcoming, 2015. *Diversity in Sinitic langu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n Hui 陈晖 & Bao Houxing 鲍厚星. 2007. 湖南省的汉语方言. *Fangyan 方言* 3: 250-259.

Dixon, R.M.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ng Hongxun 董鸿勋 1907 《古丈坪厅志》 Guzhangping Tingzhi (Guzhang Gazetteer), 光绪三十三年铅印九册, 所据为影印件

Hagège, Claude. 2000. *Halte à la mort des langues*. Paris: Odile Jacob.

Krauss, Michael. 1992.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Language* 68.1: 4-10.

Lewis, M. Paul, Gary F. Simons and Charles D. Fennig (eds). 2014.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eventeenth edition. Dallas, Texas: SIL International. Available at: <http://www.ethnologue.com>.

Li, Fang-kuei. 1939. 'Languages and Dialects', *The Chinese Yearbook (1938-1939)*.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44-46.

Moseley, Christopher (ed.). 2010. *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 3rd edition.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http://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endangered-languages/>

Nettle, Daniel. 1999. *Linguistic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ttle, Daniel & Suzanne Romaine. 2000. *Vanishing Voic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stler, Nicholas. 2010. *The last lingua franca: English until the return of Babel*. London: Allen Lane.

Peyraube, Alain. 2005. *L'homme aux six mille langues*. In J.-M. Hombert (ed.), *Aux origines des langues et du langage*. Paris: Editions Fayard, pp. 450-461.

UNESCO Ad Hoc Expert Group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2003.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UNESCO document. (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 <http://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endangered-languages/language-vitality/>

Wu, Yunji and Shen, Ruiqing. 2010. 湘西古丈瓦乡话调查报告 Xiangxi Guzhang Waxianghua diaocha baogao [Research report on the Waxiang language of Guzhang, Western Hunan].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Wurm, Stephen, and Li, Rong (eds.). 1987.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中国语言地图集. Zhongguo Yuyan Dituji. Hong Kong: Longman.

Xiong Zhenghui 熊证辉 and Zhang Zhenxing 张振兴 2008 汉语方言的分区. *Hanyu fangyan de fenqu (Th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方言 *Fangyan* 2: 97-108.

You Rujie 游如杰 1992. 汉语方言学导论 Hànyǔ Fāngyánxué Dǎolùn [Chinese Dialectology]. Shanghai: Shangyay Jiaoyu Chubanshe.

Yuan, Jiahua 袁家骅 (comp.) (1960, repr 1989). *汉语方言概要 Hanyu fangyan gaiyao [An Outline of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Wenzhi Gaige Chubanshe. (下转第 134 页)

而减少了关于私人背景的内容。

因缺乏文学年谱的写作经验,初稿写作时以年谱为参照,兼顾张承志先生生平与文学创作,并一味求全,缺乏重点与纵深感。经由张先生的指正,作者也认识到“文学年谱”的确应该以文学创作为主线,突出文学性主题,而不应该过多牵涉到私人生活背景,更兼初稿中关于张先生私人信息的内容均非第一手资料,难以验证,故定稿中此部分内容已经悉数删除。

定稿重点突出张承志先生文学创作的轨迹,增补了大量文学方面的内容,字数增加了近万字。主要包括对张承志先生重要作品及相关评论的介绍分析;对张承志先生文学创作及思想转变内在轨迹的梳理;对张承志先生的文学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的评介;及对张承志先生为中国当代文坛、思想界提供的思想意义的开掘。如增加其“信仰叙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参照意义,“相对于此前赞美母亲、人民、生命、青春等的知青叙事,《九座宫殿》、《残月》、《黄泥小屋》逐渐倾向信仰叙事,并最终在长篇小说《心灵史》中达到了文学路向的转变。从此以后,伊斯兰信仰成为张承志文学创作的精神底蕴,他以笔为旗,

为中国文化的重建提供了信仰的精神参照物,故有的学者认为‘张承志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大量小说作品,确实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法回避又没有把握甚至没有资格加以谈论的话题,即宗教信仰和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可能性问题’。再如增加张承志先生对中国当代人文精神及文化人格重建的意义,“就反抗媚俗、坚守正义、寻求精神价值的主旨来说,《清洁的精神》、《无援的思想》与此前的《心灵史》、《以笔为旗》等作品有着一致的精神延续性。这种守护精神家园的立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上成为‘人文精神’建构理想的一个有力支撑”。另外,蕴含于张承志先生文学创作中的“文明内部发言”、文明对话、关注他者文化、反殖民等思想立场在定稿中也得到了强调。基于此,我们希望研究者在引述《张承志文学年谱》时,请以重新刊发的修订版为准。

最后,对林建法主编不惜牺牲《东吴学术》的宝贵版面,重刊《张承志文学年谱》修订版的做法,我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这种破例的处理方式,需要极大的勇气,体现出对学术规范的尊重,也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学术品格。

(上接第117页)

Zhang, Min. 2011. 汉语方言双及物动词结构南北差异的成因: 类型学研究引发的新问题. Hanyu fangyan shuangjiwu dongci jiegou nan-bei chayi de chengyin: Leixingxue yanjiu yinfa de xin wenti [The reasons for the North-South difference for di-transitives in Chinese dialects: new issues arising in typological research].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2: 87-270.

【作者简介】曹茜蕾(Hilary Chappell),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二〇一〇年当选),并担任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等 SSCI 语言学刊物的编委,经常为 Linguistics, Lingua,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Journal of Pragmatics 等 SSCI 语言学刊物审稿。

【译者简介】张赞、顾小洁,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二〇一一级文秘班。

王健,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